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冲突情境下幼儿的选择性信任和信念修正

作者：李婷玉; 刘黎; 李宜霖; 朱莉琪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关于研究方法和结果部分，陈述不够清晰：比如，实验设计中最好明确陈述清楚自变量、因变量及实验设计方法；结果分析中，首先要把描述性统计结果呈现出来。然后如果是进行方程分析，自变量和因变量是什么，有无交互作用等也应该描述清楚。就这个研究而言，儿童与母亲判断是否一致的数据是百分比，但是看起来结果分析中很多都采用的是方差分析。对于百分百这种数据类型，有无跟恰当的统计方法呢？由于实验设计和结果呈现不够清晰，较难判断研究结果是否可靠。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修改稿已经根据专家的建议修改了实验设计和结果部分。

实验设计部分增加的内容见 P10“2.2 本研究属于混合实验设计。

因变量包括：幼儿对合成动物的判断（初始判断 VS 最终判断）、信息提供者的询问选择（母亲 VS 陌生人）和对信息提供者证言的选择（母亲 VS 陌生人）。

自变量包括：组间变量：年龄（4、5、6 岁）；组内变量：冲突程度（低冲突：50%—50%合成动物 VS 高冲突：25%—75%合成动物）、证言提供的前后（时间变量：证言提供前 VS 证言提供后）”

关于统计方法，因为本研究的结果变量的二分类数据，所以修改稿采用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和卡方检验。同时增加了描述性统计结果（见 P11 表 2，P11 表 3，P12 表 4）、交互作用分析等内容，见结果部分（P10—12）。分析结果发现“年龄、冲突程度和前后测交互作用显著($b = -2.78, p < 0.001$)。……结果表明，幼儿的初始判断与母亲的证言冲突低时（低冲突情境），幼儿会采信母亲的证言，并据此改变自己的初始判断；反之，幼儿的初始判断与母亲的证言冲突高时（高冲突情境），幼儿则倾向于拒绝母亲的证言，并坚持自己的初始判断。并且，年长（5、6 岁）儿童能够分辨不同冲突情境，并据此选择信任母亲并改变初始判断。具体来说，在低冲突情境下，年长幼儿比年幼幼儿更倾向于相信母亲、修正信念，在高冲突情境下，年幼幼儿比年长幼儿更倾向于相信母亲、改变自己的初始判断。”

意见 2: 引言部分提出了以往研究的几个不足。那么结果及讨论应该着重分析本研究针对这些不足, 得到了哪些新的结果。比如, 引言提到不足之一“研究忽视了幼儿的自发初始判断, 因而无法考察幼儿的已有知识与成人证言是否一致”。那么, 本研究加入了儿童自发初始判断后, 得到的结果与以往研究的结果有哪些相同和不同? 对于我们理解儿童的选择性信任有什么新的启发?

回应: 感谢审稿人的意见。本研究增加幼儿的自发初始判断和外显判断后, 发现 4~6 岁幼儿的选择性信任和信念修正受到证言与感知觉线索冲突程度的影响。在低冲突情境下, 幼儿对母亲证言的询问意愿和外显信任均高于高冲突情境, 这一结果与 Corriveau 等人(2009)的研究结果一致。

与以往研究相比, 本研究得出的新结果是: 首先, 幼儿的信念修正受到不同程度的冲突情境的影响, 在冲突程度较低的情境下, 幼儿的信念修正更容易发生。“这说明幼儿对成人语言提供的新信息持有开放的态度……这一结果为以后研究年幼儿基于成人语言输入的信念修正提供了新的方向。” (P14)

其次, 本研究发现, 幼儿的信念修正存在年龄差异, 在低冲突情境下, 年幼儿比年长幼儿更倾向于改变已有信念, 在高冲突情境下, 年长的幼儿比年幼儿更不愿意改变已有信念。“这些结果说明, 年幼儿或许能够选择性地信任信息提供者, 却不能利用信息提供者给予的信息, 考察幼儿的信念修正能够进一步了解幼儿对信息的采纳和利用情况, 也是对幼儿选择性信任结果的进一步检验。” (P14-15)

本研究在结果与讨论中增加了针对以往研究不足及本研究的新结果部分的分析和说明。例如, 引言提到“首先, 这些研究忽视了幼儿的初始判断……而且缺乏初始判断的考察就无法了解证言与幼儿已有信念的冲突情况, 也无法了解幼儿是否真的修正了已有信念。”。结果部分“本研究中的幼儿对合成动物的判断与母亲提供的证言一致的几率均小于 Jaswal (2004)研究中幼儿的反应……幼儿的初始判断与母亲的证言冲突低时(低冲突情境), 幼儿会采信母亲的证言, 并据此改变自己的初始判断; 反之, 幼儿的初始判断与母亲的证言冲突高时(高冲突情境), 幼儿则倾向于拒绝母亲的证言, 并坚持自己的初始判断。并且, 年长(5、6岁)儿童能够分辨不同冲突情境, 并据此选择信任母亲并改变初始判断。具体来说, 在低冲突情境下, 年长幼儿比年幼儿更倾向于相信母亲、修正信念, 在高冲突情境下, 年幼儿比年长幼儿更倾向于相信母亲、改变自己的初始判断。”(详见 P13 的统计结果)

同时, 在讨论部分(P13)增加对结果的原因分析: “这些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 年长幼儿面对不同的决策时, 策略更为成熟和灵活, 能够区分不同的冲突情境, 并根据冲突程度进行选择性的信任的判断、做出改变初始判断的决策(信念修正)……另一方面,

这些结果可能是由幼儿的抑制控制能力的年龄差异导致的。年幼幼儿的抑制控制能力较弱，在他人证言与初始判断冲突时，信任他人证言对幼儿来说是很难抑制的优势反应（prepotent response）……”

意见 3：逻辑需要更加清晰。例如，在测试中包括外显判断问题（选择信任信息提供者）和采信问题（最终判断）。作者觉得哪个更能测试问题的结果能真正反应儿童的采信情况？如果儿童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反应不一致，又应该如何理解这种不一致呢？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建议。本研究中，儿童在外显判断和最终判断问题上的反应一致，前言部分补充说明了这一问题。“本研究中的外显信任判断和最终判断都是幼儿有选择地信任证言的指标，外显信任判断考察的是幼儿对证言正确性的评估和对信息提供者可信性的推断，最终判断考察的是幼儿对证言的采信和应用。这两个问题共同揭示了幼儿通过他人证言获取信息、建构知识的过程。”（P6）

意见 4：研究中，呈现给幼儿的母亲图片是母亲本人，还是另一个陌生人？如果给儿童呈现的是一个陌生人来代表母亲，那么这个研究的结果和结论就很有疑问。

回应：关于这一问题，已有研究采用类似的方法，他们发现使用图片代表母亲并未发现会造成对结果和结论的严重影响(Boseovski & Thurman, 2014)。具体到本研究的实验过程中，主试在熟悉阶段与幼儿对两个图片建立了不同的角色（母亲 VS 陌生人），确认幼儿理解且能够区分两个图片所代表的身份。在后续的问题中，主试始终询问幼儿选择母亲还是陌生人、选择信任母亲还是陌生人的证言等等。图片的另一个作用是帮助主试确认幼儿的选择，当幼儿不愿意说话时，可以通过指向图片的动作作答。在幼儿指向其中一个图片后，主试会进一步确定幼儿所选图片所代表的身份。因此，从操作层面来看，使用图片代表母亲并不会严重影响实验的结果。正文的讨论部分也对此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P15）。

意见 5：从结果看起来，4 岁和 6 岁幼儿园选择询问母亲情况类似（图 5），而与 5 岁组儿童差异显著。如何解释这个结果呢？

回应：根据审稿人关于统计方法的建议，我们采用了更适合非连续、非正态分布的分类数据的统计方法，经过重新统计分析发现，询问意愿的年龄差异不显著。我们对这部分的结果表述进行了相应调整。

意见 6：论证和写作中有的地方不够严谨。如：在选择询问谁的时候结果是“年龄的主效应

显著($F(2, 71)=9.99, p < 0.01, \eta^2=0.22$), 事后比较分析发现, 5 岁组($M=0.48, SE=0.057$)的得分显著低于 4 岁组($M=0.74, SE=0.058, p < 0.01$)和 6 岁组($M=0.84, SE=0.061, p < 0.01$)的得分”。但作者的结论是“随年龄增长幼儿对信息提供者的熟悉性更加重视”。事实上, 数据分析的结果是 4 岁儿童比 5 岁儿童更多选择询问母亲。再如, 作者讨论 6 岁幼儿存在较明显的持续的询问母亲的偏好时, 提出的解释是“因为 6 岁幼儿的种群意识更强”。首先, 什么是种群意识? 其二, 本研究中母亲和陌生女性, 是属于不同种群吗? 其三, 如何解释 4 岁儿童也比 5 岁儿童更多选择询问母亲? 事实上以往研究会发现, 儿童与母亲的依恋关系可能会影响判断。Corriveau KH, Harris PL, Meins E, Fernyhough C, Arnott B, & Elliott L, et al. (2009). Young children's trust in their mother's claims: longitudinal links with attachment security in infancy. *Child development*, 80(3), p. 750-761.

回应: 感谢审稿人的意见。根据审稿人的建议, 我们采用了更适合非连续非正态分布的分类数据的统计方法, 重新统计分析发现, 询问意愿的年龄差异不显著。我们修改了这部分的结果表述, 并在讨论部分进行了对应的调整, 对原文中不够严谨的表述进行了修改, 不再从“种群意识”角度对年龄差异进行讨论。(见 P10 2.5.1 幼儿对信息提供者证言的询问意愿)

.....

审稿人 2 意见: 《冲突情境下信息提供者的熟悉性对幼儿选择性信任的影响》通过实验探讨了幼儿选择性信任问题的研究。该研究在认知发展和社会性发展这两个领域的结合上研究了幼儿的知识发展的心理机制, 也可以为学前教育实践提供理论指导。该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虽然该研究增加了“幼儿的初始判断”的考察, 但是仍与 Corriveau 等 (2009) 的研究比较接近, 所得结果也未能推导出新的结论或在理论上有所发展。

建议作者在进一步深入研究后上再投稿, 或改投其他刊物。

回应: 感谢审稿人的意见。本研究对全文的逻辑和统计方法和都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和修改。

本研究的创新点: 首先, 本研究首次考察他人证言与幼儿已有信念相冲突时, 幼儿的信念修正。结果发现“幼儿的信念修正受到不同程度的冲突情境的影响, 在冲突程度低的情境下, 幼儿的信念修正更容易发生.....这说明幼儿对成人语言提供的新信息持有开放的态度.....这一结果为以后研究年幼幼儿基于成人语言输入的信念修正提供了新的方向。”(P14)

其次, 本研究发现, 当母亲证言与幼儿已有信念冲突时, 幼儿的信念修正存在年龄差异。在低冲突情境下, 年幼幼儿比年长幼儿更倾向于改变已有信念, 在高冲突情境下, 年长的幼

儿比年幼幼儿更不愿意改变已有信念。“这些结果说明，年幼幼儿或许能够选择性地信任信息提供者，却不能利用信息提供者给予的信息，考察幼儿的信念修正能够进一步了解幼儿对信息的采纳和利用情况，也是对幼儿选择性信任结果的进一步检验。”(P15)

再次，本研究的创新体现在对以往研究过程和方法的改进，本研究不仅增加了幼儿的初始判断，还增加了外显信任判断，并且通过对比初始判断和最终判断考察幼儿的信念修正，通过外显信任判断和询问意愿两个问题共同考察幼儿的选择性信任。这种方法上的调整同时揭示了儿童选择性信任的过程和结果。

最后，本研究首次考察了中国幼儿在冲突情境下的选择性信任和信念修正，研究结果有助于揭示幼儿选择性信任的文化普遍性和特异性。“已有研究发现，中国的2岁幼儿对母亲自愿顺从(voluntary committed compliance)的程度高于同年龄加拿大的幼儿(Chen et al., 2003)。另外……在前期知识强的情况下，美国儿童比中国儿童更愿意接受冲突名称(Chan & Tardif, 2013)。由此看来，一方面中国幼儿对母亲有更高程度的顺从，另一方面，在冲突高的情况下，中国儿童更不倾向于接受冲突的证言。那么，当母亲证言与已有信念冲突时，中国幼儿是更多考虑到对母亲的顺从，还是更多考虑母亲证言与已有判断的冲突是值得探索的问题。”本研究结果表明，当母亲的证言与幼儿已有信念冲突时，中国幼儿更倾向于根据冲突的程度进行选择性的信任的决策，而非对母亲的顺从。这些结果为幼儿社会认知发展的普遍性和特异性的理论争论提供了实证依据。(P14)

编委复审意见：

意见：两位审稿人都认为这一研究课题有一定理论和实践意义，但都提出了一些问题。其中一位建议退稿，另一位大修后再审。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创新性不清楚。如一位审稿人指出“引言部分提出了以往研究的几个不足。那么结果及讨论应该着重分析本研究针对这些不足，得到了哪些新的结果。比如，引言提到不足之一“研究忽视了幼儿的自发初始判断，因而无法考察幼儿的已有知识与成人证言是否一致”。那么，本研究加入了儿童自发初始判断后，得到的结果与以往研究的结果有哪些相同和不同？对于我们理解儿童的选择性信任有什么新的启发？”。我还要进一步指出，这一问题必须在前言中着重讨论，可能的话，并在研究假说中反映出来。例如，当对 Corriveau et al.(2009)的研究进行改进或变化后，理论上，研究结果应该会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观点和依据必须清晰，合理，有说服力。如果这一问题可以解决，我可以将修改后的稿件送出再审。否则的话，建议改投其它期刊。如决定

修改,也请考虑审稿人提出的所有其它问题。除原审稿人外,我可能邀请新的审稿人参加。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意见。本研究对全文的逻辑和统计方法和都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和修改,在结果与讨论中也增加了针对以往研究不足及本研究的新结果部分的分析和说明,指出了研究的创新性。

本研究增加初始判断的考察后,与以往研究相比会有所不同。因为本研究通过对比初始判断和最终判断首次考察了当他人证言与幼儿已有信念冲突时,幼儿的信念修正。同时本研究还考察了他人证言与已有信念的冲突程度对信念修正的影响(P3、P6)。通过对比初始判断与最终判断(P12),结果发现“幼儿的信念修正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突情境的影响,在冲突程度较低的情境下,幼儿的信念修正更容易发生……这说明幼儿对成人语言提供的新信息持有开放的态度……这一结果丰富了信念修正领域的研究,为以后研究年幼儿基于成人语言输入的信念修正提供了新的方向。”(P14)

其次,本研究在引言部分指出:“由于轻信倾向仅在较年幼的幼儿身上普遍存在(Akhtar & Jaswal, 2013),幼儿根据证言更新(看不见的客体)知识和信念的能力是逐渐发展的(Ganea et al., 2007),年幼儿的信念修正存在更多困难(Kushnir & Gopnik, 2007)。本研究预期,年长幼儿可能会更理性地评估母亲的证言与感知觉线索的冲突程度、对初始判断的信心和证言的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选择性信任证言、修正已有信念。”(P7)结果发现,当母亲证言与幼儿已有信念冲突时,幼儿信念修正的年龄差异。年幼儿在低冲突情境下更倾向于改变已有信念,年长的幼儿在高冲突的情境下则更不愿意改变已有信念。这些结果说明,年幼儿或许能够选择性地信任信息提供者,却不能利用信息提供者给予的信息,考察幼儿的信念修正能够进一步了解幼儿对信息的采纳和利用情况,也是对幼儿选择性信任结果的进一步检验。(P15)

此外,引言部分还提到,已有研究的不足包括:“实验任务中的两个信息提供者都会提供证言,此时仅询问幼儿愿意询问哪个信息提供者,可能不能完全反映选择性信任情况……外显的判断问题直接考察了幼儿对双方证言正确性的评估,及对信息提供者可信性的推断。本研究中的外显信任判断和最终判断都是幼儿有选择地信任证言的指标……这两个问题共同揭示了幼儿通过他人证言获取信息、建构知识的过程。”(P6)通过增加了对幼儿外显信任判断的考察,结果发现“在幼儿的初始判断与母亲证言冲突低的情况下,幼儿在外显信任判断中更可能选择信任母亲的证言,反之,幼儿不信任母亲的证言。”(P11)

最后,引言部分补充了“跨文化研究发现,中国文化对儿童顺从的要求较高……中国的2岁幼儿对母亲自愿顺从(voluntary committed compliance)的程度高于同年龄加拿大的幼儿

(Chen et al., 2003)。另外……在前期知识强的情况下，美国儿童比中国儿童更愿意接受冲突名称(Chan & Tardif, 2013)。由此看来，一方面中国幼儿对母亲有更高程度的顺从，另一方面，在冲突高的情况下，中国儿童更不倾向于接受冲突的证言。那么，当母亲证言与已有信念冲突时，中国幼儿是更多考虑到对母亲的顺从，还是更多考虑母亲证言与已有判断的冲突是值得探索的问题。”(P5)通过考察了中国幼儿在冲突情境下选择性信任和信念修正，本研究发现“幼儿在低冲突情境对母亲证言的询问意愿和外显信任均高于高冲突情境……幼儿对自己的判断更有信心时，就会倾向于坚持自己的判断，反之，幼儿接受母亲的证言可能性更高。这个结果可能说明，与熟悉性相比，幼儿可能更看重信息提供者的准确性 (K. Corriveau & Harris, 2009) 。……本研究结果还表明，当母亲的证言与幼儿已有信念冲突时，中国幼儿更倾向于根据冲突的程度进行选择性的信任的决策，而非对母亲的顺从。这些结果为幼儿社会认知发展的普遍性和特异性的理论争论提供了实证依据。” (P14)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结果部分仍有一些疑问：请见附件具体批注。表格中的星号是什么意思？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问题。根据审稿人的建议，作者在正文中进行了补充说明：“各年龄组幼儿选择询问母亲的情况，幼儿选择询问母亲的概率与随机概率（50%）的差异如表 2 所示(*代表与随机水平之间差异显著，下同)” (P8)

意见 2：“简单效应分析发现，相比高冲突情境，在低冲突情境下，5 岁组($t = 2.76, p < 0.01$)和 6 岁组($t = 4.84, p < 0.001$)幼儿的最终判断与母亲证言的一致性更高。”这句话的意思不太清楚。是指 5、6 岁儿童最终判断的一致性高于 4 岁儿童吗？从表 4 看来差异并不大啊。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提问。这里并非在比较不同年龄儿童最终判断的一致性，而是比较不同冲突情境下的一致性。我们调整了这一部分的表述“年龄、冲突程度和前后测交互作用显著($b = -2.78, p < 0.001$)，简单效应分析发现，相比高冲突情境，5 岁($t = 2.76, p < 0.01$)和 6 岁($t = 4.84, p < 0.001$)的幼儿在低冲突情境下的最终判断与母亲证言的一致性更高。” (P11)

意见 3：“在低冲突情境下，5 岁组幼儿最终判断与母亲证言的一致性高于初始判断($t = 3.52, p < 0.001$)，且其最终判断与母亲证言的一致性低于 6 岁组幼儿($t = -2.47, p < 0.05$)。”表 4 数据看起来，5 岁组最终一致性 34.45%，是高于 4 岁和 6 岁儿童的吧？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问题。这一部分统计结果主要针对的是幼儿的信念修正，“通过考察幼儿初始和最终判断的变化来评估幼儿选择性信任后的信念修正。以幼儿信念修正为因变量……（P11）”因此仅看的最终判断的描述性结果不足以反映信念修正，从模型统计的结果来看，6岁组幼儿初始和最终判断的变化程度高于5岁组幼儿。

意见 4：另外，请作者再根据实验设计，估算一下被试量。目前美国年龄段的被试人数在25人左右，是否合适。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建议。本研究在数据收集前参考了前人研究的样本量作为本研究的样本量。

例如：Jaswal (2004)发表在 *Child Development* 的研究中使用了 24 名 3 岁幼儿($M=53$ years 8 months, range 53;2 to 53;11) 和 24 名 4 岁幼儿($M=54;5$, range 54;0 to 54;10); 在 Boseovski 和 Thurman (2014)的研究中,实验一使用了 30 名 3~5 岁幼儿($M=53.5$ months, $SD = 9.7$; 12 名女孩)和 30 名 6~7.5 岁幼儿($M = 85.4$ months, $SD = 6.7$; 16 名女孩), 实验二使用了 16 名 3~5 岁幼儿($M=53.1$ months, $SD = 10.5$; 11 名女孩) 和 16 名 6~7.5 岁幼儿 ($M=83.0$ months, $SD = 5.2$; 8 名女孩)。

本研究参考前人研究的样本量，事先决定样本量为每个年龄组 24 人左右，在达到样本量后就停止了收集数据。就本研究来看，每个年龄段的被试人数在 25 人左右是可行的。

意见 5：对于研究中设置的陌生人这一个角色，主要起到的作用是什么？从结果和讨论，看不出设定陌生人这一个角色在研究中的作用。

回应：感谢审稿人建议。研究中设置陌生人这一角色，主要作用是作为母亲的对立信息源，考察儿童对冲突信息源的选择，及其对儿童信念修正的影响。根据审稿人的建议，作者在文章的结果和讨论部分增加了相应的内容，以更清晰地表明陌生人的作用。

结果部分发现，与陌生人相比，在询问意愿上，幼儿倾向于选择询问母亲的证言。但是，在高冲突情境下，幼儿更信任陌生人的证言。“在两种冲突条件下，与陌生人相比，幼儿均存在询问母亲证言的偏好，低冲突情境下，幼儿对母亲的询问意愿高于高冲突情境。幼儿获取信息的过程中重视信息提供者的熟悉性，更愿意询问熟悉的信息提供者。（P9）”“高冲突情境下，4岁组($\chi^2 = 7.30$, $df = 1$, $p < 0.05$)、5岁组($\chi^2 = 10.59$, $df = 1$, $p < 0.01$)和6岁组($\chi^2 = 9.78$, $df = 1$, $p < 0.01$)幼儿更倾向于认为陌生人的证言正确并选择拒绝母亲的证言。（P10）”“对证言进行信任决策的过程中，幼儿不仅考虑了信息提供者的熟悉性，同时考虑了证言与已有信念的冲突性。特别是在高冲突情境下，幼儿可能更看重证言与已有信念的一致性，而非信息提供者的熟悉性。（P10）”

讨论部分增加了对实验设计的探讨“最后,本研究采用 Corriveau 等人(2009)的实验范式,将母亲与陌生人作为对立的信息源,将信息提供者的熟悉性作为实验设计的一个重要条件。考虑到如果仅由母亲一方提供证言,幼儿可能在顺从倾向下接受母亲的证言,但如果存在与自己观点一致的另一成人的信息,幼儿被给予选择的可能性。不过,在这种情境下,由于存在陌生人证言的支持,幼儿可能更容易坚持自己的已有信念。”因此,如另一位审稿专家所言,“本研究中关于幼儿是否根据母亲证言修正信念的结果可能是比较保守的。”未来研究可以尝试按另一审稿专家建议,“将信息提供者的熟悉性作为组间变量,采取单一信息源的范式(分别将陌生人或母亲作为信息提供者),进一步探讨幼儿的信念修正问题。” (P14)

.....

审稿人 3 意见:

意见 1: 在理论背景和问题创新方面,我同意审稿专家 2 的意见,即本文的研究问题和方法与 Corriveau 等(2009)的研究比较接近。作者修改之后的版本比较清晰的指出了与前人研究的区别和创新之处,比如研究了幼儿的信念修正,增加了更年长的幼儿(6 岁)从而可以更好的研究年龄变化,和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该研究的意义。我认为作者在引言中已经把这几个问题的意义阐述得很好了。关于本文对幼儿的信念修正的研究,我认为有一个问题仍然值得讨论和商榷。在该研究背景下,一直是两个人提供证言,其中陌生人的证言与被试的初始判断一致。这种情境下可能更不利于儿童对自己的信念进行修正,因为与目标证言(母亲的)相冲突的不仅仅有儿童自己的判断,还有一个陌生人的证言。所以本文得出的儿童对于信念修正的结果可能是比较保守的。在今后的研究当中,可以采取只有一个人提供证言的范式,操控这个人的身份(母亲 vs 陌生人)和证言与儿童初始判断的冲突程度(高 vs 低),这样的范式可能会更有效的看出儿童信念修正的倾向。我建议作者在文中对此问题进行一定的讨论。

回应:感谢审稿人建议。本研究采用双信息源范式,其中陌生人的设置确实不利于考察儿童的信念修正,作者在讨论部分增加了这一研究局限“最后,.....不过,在这种情境下,由于存在陌生人证言的支持,幼儿可能更容易坚持自己的已有信念。因此,本研究中关于幼儿是否根据母亲证言修正信念的结果可能是比较保守的。未来研究可以尝试将信息提供者的熟悉性作为组间变量,采取单一信息源的范式(分别将陌生人或母亲作为信息提供者),进一步探究幼儿的信念修正问题。” (P14)

意见 2: 我同意审稿专家 1 关于母亲照片的应用的问题。作者指出了是用一个陌生人的照片

同时让被试想象成母亲，这可能会削弱实验的效果。从研究结果来看，儿童是区分了两张照片的，比如他们确实更多的询问母亲超过陌生人。但是这种方法仍然不是最优的，对实验结果至少会有两个影响 1) 很有可能如果是采用母亲本人或者母亲本人的照片，那么母亲证言的效力会更强，表现在被试对两个证言人的区分度会更加明显，根据母亲的证言而进行的信念修正率也可能会更高。2) 同时，研究的一些年龄差异的结果可能也受到影响，比如发现 6 岁儿童明显比 4 岁和 5 岁儿童更多的询问母亲，这难以判断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儿童更加信任母亲，还是仅仅因为儿童能更好的把陌生人的照片想象成母亲。希望作者可以把这些对实验结果的潜在影响在讨论中进一步说明。

回应：感谢审稿人建议。使用图片代表母亲确实会削弱实验的效果。作者在讨论中，按照专家建议，对这一研究局限进行了补充说明(P14)“其次，本研究使用图片呈现信息提供者(母亲和陌生人)，这种方式的生态性可能较弱，.....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不同年龄的幼儿将母亲图片想象为母亲的能力可能存在差异,使用图片可能会对结果的年龄差异产生影响。此外，未使用幼儿自己母亲的图片，这在一定程度可能会削弱母亲证言的效力。”

意见 3：引言中关于比较中国与西方儿童对母亲证言接受，这段话逻辑和阐述不是很清晰，建议修改：“跨文化研究还发现如果 5-8 岁儿童关于物品的前期知识是弱的，更容易接受关于物品的冲突名称，如果前期知识强，则更不愿意接受冲突名称。在前期知识强的情况下，美国儿童比中国儿童更愿意接受冲突名称(Chan & Tardif, 2013)。由此看来，一方面中国幼儿对母亲有更高程度的顺从，另一方面，在冲突高的情况下，中国儿童更不倾向于接受冲突的证言。另外，Corriveau 和 Harris (2010)的文章中有讨论到美国和亚洲儿童的顺从程度，可以考虑引用: Corriveau, K. H., & Harris, P. L. (2010). Preschoolers (sometimes) defer to the majority in making simple perceptual judgment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6, 437.

回应：感谢审稿人建议。此部分已经增加了对 Corriveau 和 Harris (2010)文章的引用，并修改为“关于 3~4 岁幼儿从众的跨文化研究也发现,亚裔美国儿童的顺从率高于高加索裔美国儿童(Corriveau & Harris, 2010)。由此可见，与西方儿童相比，中国儿童对父母的顺从更高。另外，跨文化研究还发现先验知识和文化共同影响了儿童的选择性信任，一方面，如果 5~8 岁儿童关于物品的先验知识薄弱（模棱两可的合成物品，如，既像纽扣又像轮胎的合成物品），则更容易接受关于物品的冲突命名（“轮胎”），如果先验知识强（典型生活物品，如纽扣），儿童更不愿意接受冲突命名。另一方面，儿童的选择性信任存在文化差异，在先验知

识强的情况下，美国儿童比中国儿童更愿意接受冲突名称(Chan & Tardif, 2013)。由此看来，一方面中国幼儿对母亲有更高程度的顺从，那么中国幼儿应该更愿意接受母亲提供的证言；另一方面，在先验知识与证言冲突高的情况下，中国儿童更不倾向于接受冲突的证言，因而，即使证言来自母亲，中国儿童仍可能倾向于坚持已有信念。那么，当母亲证言与已有信念冲突时，中国幼儿是会在顺从倾向下接受母亲的证言、修正初始信念，还是会考虑母亲证言与已有信念的冲突性，拒绝母亲不合理的证言、坚持初始信念，这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P4)

意见 4：被试样本量的决定：文中没有阐述如何确定的被试样本量，建议加入相关说明。比如是否是根据前人研究制定的，是否是在收集数据前事先决定样本量同时在达到样本量后就停止了收集数据的。现在心理学研究的趋势是越来越重视这些信息，对于确保研究的可靠性很重要，所以建议作者把这些补充到文章中。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建议。本研究在数据收集前参考了前人研究的样本量作为本研究的样本量。

例如：Jaswal (2004)发表在 *Child Development* 的研究中使用了 24 名 3 岁幼儿($M=53$ years 8 months, range 53;2 to 53;11) 和 24 名 4 岁幼儿($M=54;5$, range 54;0 to 54;10); 在 Boseovski 和 Thurman (2014)的研究中, 实验一使用了 30 名 3~5 岁幼儿($M=53.5$ months, $SD = 9.7$; 12 名女孩)和 30 名 6~7.5 岁幼儿($M = 85.4$ months, $SD = 6.7$; 16 名女孩), 实验二使用了 16 名 3~5 岁幼儿($M=53.1$ months, $SD = 10.5$; 11 名女孩) 和 16 名 6~7.5 岁幼儿 ($M=83.0$ months, $SD = 5.2$; 8 名女孩)。

本研究参考前人研究的样本量，事先决定样本量为每个年龄组 24 人左右，在达到样本量后就停止了收集数据（已经在被试部分补充说明见 P5）。

意见 5：方法阐述当中的“初始判断问题”那一段最后一句提到“幼儿的判断与母亲一致记为“1”，与母亲不同记为“0”。这一点不清楚：既然是初始判断，为什么会有与母亲一致或者不一致？请确认是否是笔误或者进一步说明。

回应：感谢审稿人的建议。我们进行了澄清修改（P7）“幼儿的判断与研究者给母亲预设的证言一致计为“1”，与研究者给母亲预设的证言不一致计为“0”。”

参考文献：

- Boseovski, J. J., & Thurman, S. L. (2014). Evaluating and approaching a strange animal: Children's trust in informant testimony. *Child Development*, 85(2), 824-834. doi:10.1111/cdev.12156
- Chan, C. C. Y., & Tardif, T. (2013). Knowing better: The role of prior knowledge and culture in trust in testimon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9(3), 591-601. doi:10.1037/a0031336
- Corriveau, K. H., & Harris, P. L. (2010). Preschoolers (sometimes) defer to the majority in making simple

perceptual judgment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6(2), 437-445. doi:10.1037/a0017553
Jaswal, V. K. (2004). Don't Believe Everything You Hear: Preschoolers' Sensitivity to Speaker Intent in Category Induction. *Child Development*, 75(6), 1871-1885. doi:10.1111/j.1467-8624.2004.00822.x

第三轮

编委复审意见：

意见：The authors have satisfactorily addressed the issues raised by the reviewers. The study is interesting and the manuscript is in a good shape. My decision is "Accept".

P.S., there are some minor errors in the English abstract. Please improve it.

回应：感谢编委专家的宝贵建议。根据编委专家的建议，作者对英文摘要进行了仔细的修改和润色，并已经请英语为母语的专业人士把关。